



社会变迁中的贫困下岗职工 生活经历研究

1998. 9. — 2002. 6.

《社会变迁中的下岗工人研究》课题组

中华女子学院 社会工作系

北 京

目 录

题 目	1
第一章 导 论	2
一、相关文献研究综述	2
(一) 关于下岗职工问题研究	2
(二) 社会性别研究概述	7
二、研究方法	9
(一) 社会性别分析	9
(二) 定性研究	10
(三) 具体方法	11
第二章 受访者的基本情况	12
一、受访者的地区分布	12
二、受访者的性别分布	12
三、受访者的年龄分布	12
四、受访者的文化程度	13
五、受访者的婚姻状况	14
六、受访者下岗前职业	14
七、受访者的单位性质	14
第三章 研究中的发现与思考	15
一、下岗职工对贫困的理解	15
(一) 学术界对贫困的定义	15
(二) 下岗职工对贫困的理解	15

(三) 关于“下岗职工对贫困理解”的几点认识·····	19
二、下岗职工的处境与应对方法·····	21
(一) 不寻常的故事·····	21
(二)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千方百计应对贫困·····	27
(三) “跌倒爬起”与“伺机而动”——男女两性不 同的行动路线·····	34
三、性别差异分析·····	36
(一) 应对压力的感受不同·····	36
(二) 应对压力的方法不同·····	36
(三) 应对生活贫困方法的差异·····	37
(四) 再就业寻找工作时, 男女机会不等·····	38
(五) 基本恪守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	38
(六) 几点思考·····	39
四、政策分析与建议·····	40
(一) 下岗职工政策及其落实中存在一些问题·····	41
(二) 有关的社会政策建议·····	46
第四章 结论和讨论·····	49
一、简单结论·····	49
二、关于几个问题的讨论·····	50
参考文献·····	55
后记·····	58

社会变迁中的贫困下岗职工生活经历研究

中国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社会体制的转型。社会变革导致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动，同时，也引起了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原有社会结构被打破，人们被迫（或主动）放弃长久以来赖以依存的资源体系，或转换环境重新找寻新的资源，或沦为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在这一过程中成为弱势群体，1993 年以来，全国下岗职工成数倍增加，特别是 1997 年出现突发性的空前规模的下岗高潮。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常规统计，1999 年底，全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总数为 1174 万人，其中上年底结转 610 万人，当年新增 564 万人。1999 年全国多数地区下岗职工呈快速增加的态势，在第三季度末，全国只有个别地区下岗职工人数比上季度人数有所减少，多数地区下岗职工人数增加，如辽宁增加 18.8 万人，湖南增加 16.1 万人，河南增加 10.8 万人，四川增加 7.7 万人，安徽增加 4 万人（于法鸣，2000）。下岗职工的生存状态如何？她/他们在生活的巨大变动中采取了何种应对策略？她/他们对社会寄予何种期望？……

Sarah Cook 博士（英国）支持并与我们合作研究的“贫困下岗职工生活状况”课题，运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对三城市下岗职工做深入的访谈，并从社会性别角度对男女下岗职工进行了比较分析。我们认为，此研究对真实把握下岗职工生活状况，并从性别平等角度向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具有重要的启发，同时，对稳步推进国企改革也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在课题研究的一年多时间里，国家的社会变革给我们提供了生动的调查研究舞台，无论在北京，还是在长春、雅安，我们感受到受访的下岗职工在离开一直赖以依托的企业之后沉重的身心压力。虽然在她/他们下岗后，也可以获得一些救助，当地政府也出台了相关政策，但是疏漏与问题是确实存在的，有些是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些则因为政策本身缺少性别平等视角，使下岗职工没有得到益处，甚至产生了负面影响。

本课题研究所接触的个人和焦点小组的男女下岗职工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研究资料，她/他们欣然接受我们的请求，将她/他们自己的生活故事（有些是属于隐私层面的）无保留地讲给我们听，使此项定性研究可以顺利的推进。在聆听她/他们故事的同时，我们被感动，被冲击，我们看到了下岗职工坚忍不拔与生活困境抗争的顽强生命力，也看到她/他们对自己和国家的未来寄予着无限的希望。

第一章 导 论

一、相关文献研究综述

本研究主要下岗职工问题研究和社会性别研究进行文献综述。

（一）关于下岗职工问题研究

目前对下岗职工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下岗职工贫困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和社会网络的研究。

1、下岗职工贫困问题研究

近年来，国内关于城市贫困理论研究多为调查报告和统计分析，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对城市贫困基本概念和指标的探讨（李强，1992；张问敏、李实，1992；Chack Kie Wong, 1995）；二是对城市贫困原因分析（张建国，1991；郭志杰，1991；原荣华，1992；李强，1992；张灿，1994；倪虹，1995）；三是对贫困者规模的研究（张问敏、李实，1988；Chack Kie Wong 1993）；四是对贫困的社会经济根源的研究；五是对现有的反贫困政策的研究（关信平，1999）。

对城市贫困研究还有一个突出的主题，就是对下岗职工贫困问题研究，研究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认为城市贫困人口以国有企业职工为主体，统计表明，国有企业下岗或失业职工占了城市贫困人口的85%（刘加林，1998；史昭乐、黄勇，2000）。

第二，提出隐性失业显性化之后，造成我国城市人口贫困化的关键原因在于企业下岗职工或失业职工再就业难（刘加林，1998）。

第三，认为职工下岗所带来的分化与流动及再就业难度的加大，直接后果是使城市贫困层扩大，与农村贫困人口相比，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要少得多，但与农村贫困人口有所不同的是，城镇贫困人口分布相对集中，并且其收入来源较为单一，一旦失去工资来源，他（她）们的生活将难以为继，因此，相对而言，城镇贫困人口比农村贫困人口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陈大红、林聚任，2000）。

第四，现实的生活状况使下岗职工产生相对剥夺感，自认是改革的利益受损者（史昭乐、黄勇，2000）。

第五，在宏观上将下岗现象当作一种失业现象，探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与这种特殊的失业现象之间的关系，并且分析下岗职工中的贫困问题，以及探讨解决下岗问题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关信平，1999）。

上述研究对于认识我国下岗职工贫困问题有重要的意义，但它对下岗职工贫困是如何被制度（体制）建构出来的，尚缺乏足够清晰的分析。

2、下岗职工社会保障研究

随着体制转轨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社会保障体制问题成为学界研究热点之一。研究大方向是社会保障体制建设。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其具体研究领域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回顾中国社会保障体制的历史和现状¹；二是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研究（张杰，1994；刘伟能、唐钧等，1995；邓晓芬，1995；方志勇等，1995；唐钧，1997，1998，1999；丁朗父，2000；唐钧、Sarah Cook 等，2000）；三是社会保障理论模式研究（杨旭春等，1996；杨伟民，1996；张映芹，2000年）；四是社会保障管理体系研究（周顺明，1998）；五是社会保险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失业保险研究（杨芳勇，1996；袁志刚，1996）、医疗保险研究（丛树海，1997；葛延

¹ 中国社会保障编辑部，2000，《中国社会保障走过 50 年》，《社会保障制度》第 1 期。

风，1998）及养老保险研究（毛才高，1998；葛延风，1998）；六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保障研究（周顺明，1996；张旭，1998；韩福文，1998；张旭，1998；张红伟，2000）。

关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研究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描述了国企下岗职工的生活状况、就业状况、心态状况；分析下岗职工的社会保障在生活保障、就业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如未能再就业者的长期生活得不到保障问题，社会保险费用和劳动关系上社会保障不健全形成的阻力，对再就业的严重影响等；提出了生活保障、就业保障对策：“再就业中心”→“失业保障中心”→“社会救济”三个环节应互相衔接，解决劳动关系与劳动岗位相背离的难题，新老企业共同分担社会保险费用等（郭士征，1998）。

第二，指出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对象应该主要是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或他（她）们的家属。如果没有“低保”制度，这部分人势必成为企业难以摆脱的负担，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难点，甚至激发出更大的社会矛盾。“低保”制度是下岗职工的定心丸（丁朗父，1999）。

第三，认为为适应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及再就业工作的需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应运而生，并与承担市场经济常态下风险的失业保险制度形成不同的职能分工，作为改革特定发展阶段的特殊安排，专门解决长期积累下来的历史遗留问题。它按政府、企业和社会的“三三制”要求来筹资，在失业保险之上为下岗职工设置了一道保障先，保障下岗职工基本生活和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

第四，提出建立下岗职工的生活保障的对策建议，主张应区别工龄适度提高保障标准，认为这主要是基于五项原则：改革成本补偿原则、与促进懒惰无关原则、促进消费需求原则、根据不同工龄确定不同标准原则、当地物价指数与最低工资指导线原则；主张改

变下岗保障及其操作完全行政化的状况，做到有法可依等（石晨光，2000）。

第五，认为下岗职工的迅速增加与尚未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之间形成尖锐的矛盾，大量的下岗职工长期滞留在本企业的根本原因，是尚未形成覆盖全社会的统一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制度，下岗职工离开了企业也就失去了这些保障。由于利益驱动不愿割断与原所在企业的关系，出现了相当一部分下岗职工隐性失业与隐性就业并存的现象，也为组织再就业工作带来很大困难，所以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王红星，1998；李强等，1999）。

上述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社会保障研究，只限于描述性研究，而没有解释性研究；只限于实证性研究，而没有理论性研究。

3、下岗职工社会网络研究

网络理论于20世纪60年代兴起、70年代快速发展、80年代成熟到90年代兴盛。继结构—功能主义统治了40—60年代的欧美社会学界理论后，从70年代初至今，社会网络理论则占据着欧美社会学特别是美国社会学主流地位。

（1）国内关于社会网络研究

关于社会网络，国内早已有许多学者对它作了大量研究（费孝通，1948；费孝通、张之毅，1990，1998；桂勇，1997；孙立平，1996；李培林，1996；彭庆恩，1996；孙治本，1995；边燕杰，1994；杨国枢，1994；黄宗智，1992；杨美慧，1989；乔健，1988；金耀基，1988），得出了富有价值的结论，如认为关系是一种建立在个人交往之上的特殊主义人际联系；关系在个人的地位获得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社会网决定60%—70%的职业流动等；在不同关系类型的作用上，一些研究者观察到的是与格兰诺维特的弱网的强力相反的现象，只是没有把区分了的关系类型，如亲缘、地缘、情缘、学缘等的强度进行测量，从而也就没有对网络的差异效应展开研究，所以并不包含着与格兰诺维特弱网的强力这个假说的对话（张其仔，1999）。

与格兰诺维特弱网的首次对话，是边燕杰等人对天津就业问题

的研究。他们所进行的强关系力量假设研究对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力量假设和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研究提出了挑战。边燕杰指出，在中国计划经济的工作分配体制下，个人网络主要用于获得分配决策人的信息和影响而不是用来收集就业信息，是强关系而非弱关系可以充当没有联系的个人之间的网络桥梁。他的主要贡献是在分析中国的工作分配制度时，区分了在求职过程中通过网络流动的是信息还是影响；求职者使用直接还是间接关系来获得信任与影响（边燕杰，1997a, 1997b）。

· (2) 下岗职工社会网络研究

至于对下岗职工社会网络研究，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作有二篇论文：一是“再就业政策与下岗职工再就业行为”（王汉生、陈智霞，1998）；另是“社会支持结构的转变：从一元到多元”（丘海雄、陈健民、任焰，1998）。

第一篇论文认为关系是下岗职工实现个人行动策略的关键因素，关系在下岗职工寻求“第二职业”或其它新资源的过程中主要的作用体现在：关系（亲戚、朋友、熟人）是各种就业信息的提供者；关系起着一种信誉保障的作用；关系可以为下岗职工的经济活动提供庇护；关系还可以为下岗职工提供资金上的帮助。因此，对于其它资源相对缺乏的下岗职工来说，关系更是实现个人行动目标最可依赖，也是重要的个人资源。关系网络是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主要途径。

第二篇论文通过下岗职工对体制内外获得的经济和就业支持等不同资源的利用，分析了下岗职工的社会支持结构。结果发现，下岗职工在解决经济困难和寻求再就业的支持上，正式社会网络（政府、企业、社区组织、市场）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非正式社会网络（血缘关系、亲缘关系、业缘关系、地缘关系、私人关系）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会支持结构已经从改革前资源主要由国家通过单位向个人提供的一元化结构，逐步转变为社会资源分布的多样化和多元支持结构。

两项研究有着相同的结论，即下岗职工是得到社会网络支持的。

其实，这些研究只反映了一面的社会事实，而没有关注另一面的社会事实的存在，有些下岗职工不仅没有得到社会网络的支持，而且受到社会网络断裂的伤害。本研究研究的关注点之一就是下岗职工非正式社会网络断裂及其过程而形成的社会排斥。

（二）社会性别研究概述

70年代开始，女权/女性主义者对生物决定论提出的性别等级是由男女的性差异决定的，是生来如此的解释产生了深刻的质疑，进而提出了社会性别（Gender）概念，它可以说是当代妇女理论的核心概念和女性主义学术的中心内容。

尽管女性主义理论本身对这一概念有不同的观点和解释，但总的说来我们还是可以提取有关社会性别理论的核心要素：严格区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将生理性别定义为人的生物特征，而社会性别指的是以社会性的方式建构出来的社会身份和期待。认为男女两性各有承担的性别角色并非是由生理决定的，而主要是在社会文化的制约中形成的，也是随着社会文化的变化而变化的。人作为一种生物，处处都打上了社会文化的烙印，生理的性别并不是性别的社会分工的主要依据，对性别角色的期待和评价（男高女低、男优女劣等等）更主要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又反过来通过宗教、教育、法律、社会机制等得到进一步发挥和巩固，在国家参与运作下被规范化、制度化、体制化、两极化（男女二元对立）、社会期待模式化。鉴于此，女权/女性主义者提出了“社会性别”概念，用来解释后天的、社会的文化养成的，可置换可改变的男女角色和性别关系。认为社会性别不是一个男人和女人的代名词，不是简单的男人、女人的角色，它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一种社会结构，是表示权力关系的一种途径。强调应该把性别，或生物意义的男性、女性同由社会形成的男女两性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加以区别。尽管将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作真实地截然区分是困难的，但是概念上的区分是很有价值的。社会性别概念能够清楚地表明，关于性别的成见和对性别差异的社会认识，决不是“自然的”。尽管社会性别是维持性别歧视的基本手段，但是它作为一种社会构成，是可以被改变，乃

至被清除的。

女权/女性主义者以社会性别理论向以男性为中心的各学科领域挑战。被称为学术领域的一场革命，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社会性别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分析范畴，在决策、各个学科领域中被用来作为阐述和分析问题的概念和理论，更是成为一种新视角、新方法。

西方女权/女性主义者对社会性别理论研究侧重于分析人类社会中两性不平等的实质和根源，是对社会性别元理论的发展和丰富，是其它研究的理论支撑。这一方面的研究从波伏娃 (Simon de Beauvoir, 1972) 的《第二性》、弗里丹 (Friedan, 1963) 的《女性的奥秘》、到米莉特 (Millett, 1971) 的《性的政治》，在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做出了本质的区别，坚持认为社会性别是社会建构起来的，独立于生理性别。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社会性别与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分析范畴和研究领域。它注重分析研究一个项目或一种政策对男女产生的不同影响，探索造成这种差别和影响的原因，并寻找种种途径来避免这类带有等级和歧视的处理方式和结果。西方不同流派的女性主义基于对妇女与发展关系的不同认识，产生了侧重点不同的发展政策：妇女参与发展 (WID) 和社会性别与发展 (GAD)。前者是指在不改变现有的社会分工格局，满足现存的社会性别生存需求，包括来自两性现存生产和再生产角色，满足这些利益将使两性有效完成并继续完成现有角色要求。后者是针对妇女从属于男性的地位和权力，目标是改变现有的社会性别不平等状态，包括：家务劳动和养育子女的平等分工并社会化，创造平等的就业、参政的机会，消除对妇女的暴力等。同时，强调要充分考察妇女的多种角色、打破陈腐的角色定型，保障妇女对资源的掌握、控制和利用，始终关注发展是否给妇女带来真正的好处。

1993 年，西方社会性别理论被传播到中国，1995 年世界妇女大会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主义学者在不同的领域、针对不同的现象，明确地从社会性别角度来考察、分析、研究来研究中国妇女问题和男女两性关系问题，进行理论的挑战 (李小江等, 1997; 李

银河，1997；王金玲，1997；张李玺，1998；金一虹，1998；杜芳琴，1998；高小贤，1999；佟新，2000；李洪涛，2000）。形成较具特色的研究。这些研究，已经不满足于对现象的描述，而是深入探究特定现象意义，即现象背后的含义或是社会力量和各种利益的运作较量，并力图去打破一些习以为常的概念和假定。学者经常提出的问题是：这种现象反映了怎样的社会性别关系和社会性别观念？这种现象基于何种假定和“常识”？这些假定和“常识”又是怎么来的？蕴含了什么样的权力关系？等等。而且学者们多半并不是孤立的对妇女的研究，而是将妇女和社会性别关系置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历史变迁中来考察；很少追求超越地区与文化的一般理论，而是努力将自己的学术研究置于中国特定的情景，强调女性社会学的本土化。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包括社会性别分析、定性研究和一些具体方法。

（一）社会性别分析

社会性别分析是“指任何把社会性别当作分析的关键范畴的理论框架或科研方法”（谭兢常、信春鹰，1995）。“社会性别分析范畴的创立同女性主义在学术界的目标紧密相连，即对男性中心文化提出批判质疑，改造人类知识，最终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王政，1997）。

社会性别分析是新的方法和视角，它把社会性别视为与其在社会制度（如经济体制、政治制度、社会文化、资源分配）中得到复制、传递和巩固的相关问题；它是把社会性别概念转化为社会实践的工具，如女性主义致力于把性别分析运用于发展，注重研究具体政策或项目对男女两性产生的不同影响，并致力于消除发展中的不平等和歧视。

社会性别分析方法对于传统的意识和决策思想方法发起挑战，成为女性主义者推动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有力武器。“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主流”，并在每一个重大关系领域中重申社会性别分析的方法

的运用，成为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主旋律。

本研究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方法，研究社会变迁中的经济体制和社会政策对男女两性下岗职工的不同影响，改善下岗女工弱势地位，从而真正改变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

（二）定性研究

“定性研究”是在批判理论、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对传统的“定量研究”强调中立和客观的方法的质疑和其忽视个人经验和主观体验的挑战中而越来越成为研究者关注和运用的研究方法。

“定性研究”是一种“相对于‘量化研究’的归类”（胡幼慧，1996），即是“在自然环境下，使用实地体验、开放型访谈、参与型和非参与型观察、文献分析、个案调查等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细致和长期的研究；分析方式以归纳法为主，在当时当地收集第一手资料，从当事人的视角理解她/他们行为的意义和对事物的看法，然后在这一基础上建立假设和理论，通过证伪法和相关检验等方法对研究结果进行检验；研究者本人是主要的研究工具，其个人背景以及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对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影响必须加以考虑；研究过程是研究结果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必须详细加以记载和报道”（陈向明，1998）。

定性研究的基本内涵和女性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各派女性主义都关注妇女的“生活”、“主观经验和感受”、“主观经验的社会反映”，这也正是“定性研究”所注重的。同时定性研究中多元、动态、反思、创新、反传统等特点，也给女性主义对妇女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深入的通道。因此，定性研究和女性主义的结合，或者说，女性主义的定性研究，对“无声”的、女性群体在传统的以男性为主的社会理论中被忽视的事实的重视，对女性个人经验和主观体验的挖掘和深入解释，对微观层面女性问题或经验与宏观层面社会结构间的联系都有知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张李玺，1999）。

定性研究为本研究关注下岗女工对贫困的主观经验和感受以及她们的解释，注重对下岗女工的人际关系和互动的探讨，并从宏观社会结构层面，考察社会变迁中体制转型引发的下岗的结构性原因，

对下岗决策过程中的性别化和性别盲点以分析，提供了方法论原则和具体方法。

（三）具体方法

1、文献分析

理论分析。本课题对一些理论文献，如：西方经济学、人口学和社会学中对贫困问题的理论观点和论述；中国学者对城市贫困的论述；社会性别理论的研究等做出较为深入的分析。

国家政策、法规分析。主要是对政府关于下岗职工的政策分析。

其它实际调查资料的分析和应用。主要是中国国内已有的对下岗职工和贫困问题的实际调查资料分析。

2、实地社会调查

试访谈。课题组共同研究确定了个案和小组访谈提纲后，在北京通过街道妇联联系，对2个个案和1个小组（8人）作了试访谈，在此基础上对提纲进行修改。在1999年3月8—12日的长春调查中，课题组成员根据实际情况和取得的经验再次对提纲进行修改。

深入访谈。课题组在北京、长春、四川雅安通过三地妇联系统联系，对24个个案（其中包括18个女性，6个男性，每地8个个案）进行了深入访谈。

焦点小组。课题组在北京、长春、四川雅安通过三地妇联系统联系，对9个小组（每地3个小组，其中包括6个女性小组，3个男性小组）进行了焦点问题访谈。

3、访谈资料分析

把访谈录音资料转写为文字资料；

对个案和小组资料中的“信息码”进行分类编码，北京、长春、雅安的编码为BJ、CC、YA，个案、焦点小组的编码为P、G，女性、男性的编码为F、M；

对资料进行分类整理；

分析资料，写出报告。

第二章 受访者的基本情况

一、受访者的地区分布

96 名受访者来自于北京、长春、四川雅安。

北京 33 名受访者中，有 9 名个案被访谈者，24 名焦点小组被访谈者。

长春 31 名受访者中，有 8 名个案被访谈者，23 名焦点小组被访谈者。

四川雅安 32 名受访者中，有 8 名个案被访谈者，24 名焦点小组被访谈者。

二、受访者的性别分布

在 96 名受访者中，有 66 名女性，其中包括 19 名个案被访谈者，47 名焦点小组被访谈者；有 30 名男性，其中包括 6 名个案被访谈者，24 名焦点小组被访谈者。

北京个案受访者中，有 7 名女性被访谈者（一位受访者因病重说话吃力，录音无法辩听，又补做一位），2 名男性被访谈者；焦点小组受访者中，女小组（1）有 6 名被访谈者，女小组（2）有 10 名被访谈者，男小组有 8 名被访谈者。

长春个案受访者中，有 6 名女性被访谈者，2 名男性被访谈者；焦点小组受访者中，女小组（1）有 7 名被访谈者，女小组（2）有 8 名被访谈者，男小组有 8 名被访谈者。

四川雅安个案受访者中，有 6 名女性被访谈者，2 名男性被访谈者；焦点小组受访者中，女小组（1）有 8 名被访谈者，女小组（2）有 8 名被访谈者，男小组有 8 名被访谈者。

三、受访者的年龄分布

受访者的年龄在 25-55 岁之间。

北京个案受访者中，2 名男性的年龄是 34 岁、43 岁，6 名女性的年龄从 36-46 岁，1 名未登记；焦点小组受访者中，女小组（1）6 名被访谈者的年龄从 35-48 岁，女小组（2）8 名被访谈者的年龄从 36-49 岁，2 名未登记，男小组 8 名被访谈者的年龄从 40-55 岁。

长春个案受访者中，2名男性的年龄是40岁、46岁，6名女性的年龄从30-50岁；焦点小组受访者中，女小组（1）7名被访谈者的年龄从30-40岁，女小组（2）8名被访谈者的年龄从35-45岁，男小组8名被访谈者的年龄从32-52岁。

四川雅安个案受访者中，2名男性的年龄是30岁、39岁，6名女性的年龄从31-42岁；焦点小组受访者中，女小组（1）8名被访谈者的年龄从25-48岁，女小组（2）8名被访谈者的年龄从32-42岁，男小组8名被访谈者的年龄从25-55岁。

研究人员在寻找受访者时遇到许多困难，最终实际确定的被访谈者的年龄比研究计划中的被访谈者的年龄分布要广。

女性比男性被访谈者的年龄偏大。三地相比较而言，被访谈者的年龄大小，依次是北京、长春、雅安；年龄分布宽窄，依次是雅安、长春、北京。

四、受访者的文化程度

从总体上看，受访者的文化程度有文盲、小学、初中、高中（中专、中技）、大专、大学等6个层次。

北京个案受访者中，有5名初中文化程度，1名中专文化程度，2名高中文化程度，1名未登记；焦点小组受访者中，有10名初中文化程度，9名高中文化程度，2名大专文化程度，1名大学文化程度，2名未登记。女性被访谈者中，有10名初中文化程度，9名高中文化程度，1名大专文化程度，2名未登记；男性被访谈者中，有5名初中文化程度，1名中专文化程度，2名高中文化程度，1名大专文化程度，1名大学文化程度。

长春个案受访者中，有4名初中文化程度，3名高中文化程度，1名大专文化程度；焦点小组受访者中，有9名初中文化程度，5名中专文化程度，8名高中文化程度，1名大学文化程度。女性被访谈者中，有11名初中文化程度，10名高中文化程度；男性被访谈者中，有2名初中文化程度，5名中专文化程度，1名高中文化程度，1名大专文化程度，1名大学文化程度。

雅安个案受访者中，有4名初中文化程度，4名高中文化程度；

焦点小组受访者中，1 名文盲，17 名初中文化程度，3 名中专文化程度，3 名高中文化程度。女性被访谈者中，有 16 名初中文化程度，2 名中专文化程度，4 名高中文化程度；男性被访谈者中，有 1 名文盲，5 名初中文化程度，1 名中专文化程度，3 名高中文化程度。

北京、长春受访者中，男性比女性的文化程度略高。雅安受访者中，女性比男性的文化程度略高。三地相比较而言，被访谈者的文化程度高低，依次是北京、长春、雅安。

五、受访者的婚姻状况

从总体上看，受访者的婚姻状况是未婚、在婚、离婚、丧偶。有 15 个单亲（母亲）家庭。

北京受访者中，有 21 名在婚，7 名离异，2 名丧偶，3 名未登记。长春受访者中，有 1 名未婚，26 名在婚，2 名离异，2 名丧偶。雅安受访者中，有 1 名未婚，27 名在婚，3 名离异，1 名丧偶。三地男性均在婚。北京、长春、雅安单亲（母亲）家庭分别有 9 个、3 个、3 个。下岗使女性婚姻受到冲击。

六、受访者下岗前职业

从总体上看，受访者下岗前职业有工人、干部、专业技术人员。

北京受访者中，有 21 名工人，5 名专业技术人员，4 名干部，3 名未登记。其中 3 名女性是专业技术人员 17 名女性是工人；4 名男性是工人，2 名男性是专业技术人员，4 名干部都是男性。

长春受访者中，有 24 名工人，1 名专业技术人员，5 名干部。女性全部是工人，有 20 名；男性有 4 名工人，1 名专业技术人员，5 名干部。

雅安受访者中，有 28 名工人，3 名专业技术人员，1 名干部。女性有 20 名工人，2 名专业技术人员；男性有 8 名工人，1 名专业技术人员，1 名干部。

七、受访者的单位性质

从总体上看，受访者的单位性质是全民、集体、合资。

北京受访者中，16 名在国营企业，13 名在集体企业，1 名在合资企业，3 名未登记。女性 10 名在国营企业，10 名在集体企业；男